

政治·外交

## 国际政治复合系统论：一种分析方法

杨思灵

**摘要：**系统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国际政治中，学界对国际政治系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新现实主义理论就蕴含了系统的思考。不过单纯的系统决定论有一定的局限，确切地说，国际政治由多个复合系统所构成，行为体的多元、战略构成多线性、实践要素多重构成以及不同动力的相互作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基于国际政治系统的复合属性，各个行为体形成了不同的对外战略路径依赖，行为体对路径依赖的调适空间与时间也由国际政治复合系统决定。准确认识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意义显而易见，不仅可以准确把握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也可以为提出较为准确的对外政策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把握国家关系的战略调适方面。同时，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变迁历史也充分说明生产力的先进性始终是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般性要素。

**关键词：**国际政治；复合系统；路径依赖；现实主义；生产力

**收稿日期：**2023-04-20

**作者简介：**杨思灵（1977—），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南亚政治。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再至自然与社会的交相互动，系统无处不在。很早时候，人类就已经学会运用系统的方法来观察世界。首先提出相对成熟的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是西方学者，他们围绕大国权力政治的变化提出了国际政治系统理论，其分析的主要脉络在于极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系统的稳定与不稳定。当然，以大国为最主要行为体的分析极大地简化了系统分析的复杂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局限性，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僵化的系统决定单元论不仅难以解释一些行为体的行为，也难以对一些缩小或扩大了“行为体”行为进行解释。事实上，国际政治系统并非简单的系统与单元之间的决定论或互动论，更像一个俄罗斯套娃，每一层都有系统，国际政治系统或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互动。换言之，国际政治由复合系统构成，这是分析国际政治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

## 一、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系统论

系统论不是新生事物。根据侧重点不同,一些学者对系统概念的界定也稍微有所不同,<sup>①</sup>但总的来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特性是系统普遍的特征。有学者通俗地指出,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整体,单个要素不能构成系统,世界上的一切具体事物、现象和概念都可以构成系统。<sup>②</sup>L·贝塔兰菲认为系统的概念难以确定,但总体上可以分为实际系统和概念系统。实际系统就是可以观察到、实体存在的系统。概念系统则是观念的、逻辑的系统。<sup>③</sup>迄今为止,系统论在系统科学、系统技术、系统哲学等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严格意义上,系统论概念的出现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相结合的成果。

系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深受系统论思想的影响,这些理论所使用的“结构”“秩序”“层次”“制度”“建构”等重要概念均与系统论思想密不可分。有的西方学者的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系统论思想的影响,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新现实主义是在承认古典现实主义主张的国家作用的基础之上考察由众多国家行为体构成的系统以及这些国家在系统中的互动。制度自由主义尽管批评现实主义的观念,但实际上是在国际政治行为体方面对现实主义进行了补充,尽管在制度作用方面,其论点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建构主义似乎更像一个观念上的系统论,认为结构由观念造就,人们依据身份和利益行事。可见,这些理论几乎都是以系统观念为基础的。只要是对国际政治进行结构、层次分析,那么就离不开系统论,即系统是对国际政治进行层次分析的前提。<sup>④</sup>可以说,以系统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产生了还原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前者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后者则探讨结构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sup>⑤</sup>以系统为理论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的代表人物包括莫顿·卡普兰、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杰维斯、斯坦利·霍夫曼等。

莫顿·卡普兰认为国际政治系统在其子系统中有一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被称为国际行为体,分为“国家行为体”子集和“超国家行为体”子集。<sup>⑥</sup>国家行为体指的就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超国家行为体包括地区和全球性组织。莫顿·卡普兰最为人所知的是其根据大国霸权提出了六种国际政治系统,即“均势系统”“松散的

① 参见萧南槐:《大系统论:预测决策管理方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5页。

② 邹珊刚等:《系统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③ L·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修订版前言第10页。

④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⑤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104页。

⑥ 莫顿·卡普兰著,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两极系统”、牢固的两极系统、全球性系统、定向性或非定向性的等级系统、单位否决系统。<sup>①</sup> 其典型的特征是以大国权力为基础，分析大国之间的互动可能形成的国际政治系统类型。在这些系统当中，有的是基于历史上出现过的历史经验，有的是笔者受所处时代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对峙的启发而形成，有的是对处于战争状态的互动模式进行归纳得出的结论。总体上来看，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系统论主要用于分析历史经验而非对未来系统的变化做出反应或者预测。

将国际政治系统论赋予预测和研判功能的学者是肯尼思·华尔兹。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了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的简约模式：互动单元在结构中互动，结构决定单元行为，互动单元也会对结构产生影响。<sup>②</sup> 结构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延伸，也促使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成为冷战时期的理论范式。该理论为国家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寻找根本上的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影响，该理论具有机械论的特征。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不同的国家在相同的国际政治结构之下的行为选择应当相同，事实是面对相同的国际政治结构，国家行为体的选择不尽相同，比如在冷战时期的格局下，有的国家选择结盟，有的国家则选择不结盟，国家行为体的差异性并不受国际政治结构的统一。这使得肯尼思·华尔兹的理论严谨性受到挑战，也使其想要依靠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論对国家行为体的选择做出预测变得不可靠。

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系统论的主要聚焦点并不在于提出系统模式，而在于找出系统因何而变化的因素和条件。在罗伯特·杰维斯看来，社会生活和政治构成了系统，而且许多结果都是复杂互动的而非故意的产物。针对肯尼思·华尔兹的理论，他认为几乎没有什么人类行为的领域是完全由系统层次决定的。罗伯特·杰维斯认为系统应当具备两点特性：一是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二是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sup>③</sup> 当然，罗伯特·杰维斯的系统论提出系统的结果往往难以预料，因此充满复杂性。他提出并分析了反馈、关系、替代选择与谈判、结盟、信息等系统在系统中的作用。

中国国内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政治系统论进行了研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者就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系统论思想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提出用整体思维认识世界。<sup>④</sup> 随后有学者也提出用系统演化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sup>⑤</sup> 在将

---

① 莫顿·卡普兰著，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第 55 页。

②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3 页。

③ 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 页。

④ 乌杰：《系统辩证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7 页。

⑤ 王帆：《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复杂系统观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0 期，第 41—50 页。

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中，有学者提倡用系统思维的方法来思考国际关系。<sup>①</sup> 薛力对国际政治中出现的结构观的来源以及代表性观点进行了介绍。<sup>②</sup> 唐世平等基于罗伯特·杰维斯的理论提出了系统效应分析模型，即根据系统变化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意图和非意图、立即和延迟、发生与未发生作为四个维度，衍生出分析多重系统的影响模式。<sup>③</sup> 李少军基于国际政治系统的复杂性，提出需要加深对确定和不确定性的理解。<sup>④</sup> 也有学者提出了国际政治系统效应的三重价值：启示价值、解释价值和实践价值。<sup>⑤</sup> 王帆认为系统观对于如何认识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尽管系统的演化具有不确定性，但系统思维可以使我们能够更辩证地看待这个世界。<sup>⑥</sup>

## 二、国际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

国际政治系统是实际形态与观念的结合，它不像我们熟知的一些系统那样井井有条，比如城市管理系统、排水系统、单位系统、军队系统和社区系统等。很大程度上，国际政治系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观念之中，当然也是现实中的国际政治系统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可以说，国际政治系统由一个或多个子系统构成，并处于普遍联系的状态。在地理空间基础之上，各个子系统并非独自存在，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这种联系可能表现为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这种联系既可以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联系，也表现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了一对一的线形联系，也包括了一对多的散状联系，更包括了多对多的网状联系。就此而言，国际政治系统的行为体至少应为两个。同时，国际政治系统处于不断统一的矛盾运动之中。各个组成国际政治系统的子系统也是处于运动中的。这种运动的方向由有序和无序规定，运动的阶段性结果由各个子系统的变化所决定。国际关系系统运动包括成长、演化、升级、崩溃、转化等阶段，在这些运动阶段中，始终包括了无序与有序的统一。无序与有序的矛盾运动塑造着国际政治系统前进的方向。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系统应包括战略构成要素系统、行为体构成要素系统、实践要素系统与动力要素系统。

---

① 王政达、刘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第18—21页。

② 薛力：《从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项系统的考察——兼论华尔兹结构观的局限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29—40页。

③ 唐世平、王凯、杨珊：《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4—20页。

④ 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23—38页。

⑤ 曾亚勇：《国际关系中“系统效应”的三重价值：一种理论的分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第12—22页。

⑥ 王帆：《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复杂系统观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41—50页。

### （一）战略的构成要素

行为体系统是复杂的，不仅包括各种具有自己战略主张的国家行为体，还有同盟、国际组织与地区组织、战略伙伴等，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论述。那么在此基础上，各种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就构成了战略要素系统，各个行为体通过对彼此战略的回应催动国际政治系统的运行。理论上，整体的国际政治系统由无数个地区、次地区系统构成。不管是全球层面的国际政治系统，还是地区 / 次地区的国际政治系统，基于行为体考虑其战略要素以及战略要素之间的互动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主题。在这个层面，需要考虑两个角度上的战略构成要素。

1. 单行为体的战略要素集合。单行为体的对外战略本身也是一个系统，比如中国的外交战略至少由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三个要素所构成。如果从具体领域来看，可以划分为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和科技外交等。大国都愿意从大战略的角度来构建外交战略体系，因此，包括了多方面的具体要素。比如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从地区来划分，其外交战略主要分为欧洲战略、“印太战略”与美洲战略；从领域来划分，同样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互动等。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往往是一个系统。以近年来比较热门的“印太战略”而言，已经颁布“印太战略”的国家体现的内容都不是单一的元素，而是由多个要素共同构成。这个多要素的战略构成反映了国际政治系统的复杂性。这点从行为体要素系统就可以看出，战略互动的对象包括的类型很多，不可能采用一种外交模式就可以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2. 多行为体的战略集合。这个视角是与第一个视角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是切入点不一样。在单行为体的对外战略系统中，主要是从单行为体的视角切入来分析其他行为体对单行为体国家战略的反应与互动，同样需要考虑其他行为体参与该行为体战略构建的一个过程，形成似乎该行为体处于核心的现象。多行为体的战略集合是在辨识国际政治系统的基础上，确认参与国际政治系统的行为体以及这些行为体战略的互动。比如在亚太地区确认印太是一个国际政治系统，那么其参与行为体就包括了有不同利益诉求的超级大国、地区大国、中等强国与中小国家。在此基础上，确认和分析这些行为体的地区战略要素构成就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因为只能根据这些行为体的战略要素的分析才能尽可能认识到这些行为体的真正目的以及这些行为体的战略之间可能会产生怎样的互动。当然这并不排除会很纷繁复杂，互动的结果也可能往往出人意料，但复杂本身就是国际政治系统最重要的特征。

### （二）行为体的构成要素

行为体是国际政治系统的第一要素。绝大多数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是围绕行为体行为而展开的。从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建构主义，人们所认知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单个的个人，到国家，再到政府与非政府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地方政府等均可以视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体。

1. 国家行为体是国际政治系统中需要考虑的第一位因素。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国家行为体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国家行为体集，在这个集里包括了超级大国、地区大国、中等强国与中小国家等。古典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国家的角色，结构现实主义其实也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则强调了国家与非国家角色。虽然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趋势仍然在继续，今天的世界依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制度自由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并未改变大国是按照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来行事的特征。在这个背景之下，在一般性的战略逻辑下，即在大国追求地缘政治权力的逻辑下，国家显而易见依然是国际政治系统中最重要行为体。一般的个人虽然是推进国际政治系统产生变化的重要力量，比如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一群人，再如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家，但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在国家这个层面得到体现。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等虽然也是国际政治行为体，但往往处于被国家所束缚的境地。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中美贸易战”中得到深刻体现。在国家行为体的强力约束下，美国的企业只能遵循美国的地缘政治权力逻辑，与中国进行“贸易战”。

2. 同盟是国际政治系统中的重要行为体。同盟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因共同利害而缔结的政治、军事或经济等方面的联合和协作关系。<sup>①</sup>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同盟概念的外延得到延伸，比如经济同盟等。本文所指的同盟主要是安全和军事同盟。历史上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战争几乎都伴随着同盟的出现，比如一战和二战。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结盟反盟成为一种常态。冷战时期是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与苏联为首的同盟相互争斗为最主要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讲，同盟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系统中近乎长期存在。同盟的消失只有在人类能够和平共处、放弃对国际政治权力的追求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考虑到以国家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仍然是国际政治系统最为重要的特征，这两个条件均难以实现，那么为了追求地缘政治权力，或者追求具有排他性质的利益，同盟就会长期持续存在。冷战之后，苏联同盟解体，但美国主导的同盟并没有解体，反而在不断加强。只不过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过去是美苏之间的竞争与对抗，现在则变成了美国与中俄之间的竞争与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不断在强化，中国官方虽然拒绝同盟，但与一些国家保持了类似同盟的关系，比如俄罗斯、巴基斯坦等。总之，尽管同盟本身属于特殊战略逻辑下的产物，因为其产生基于特定的对象，不如国家那样具有一般性，但鉴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系统的存在，虽然具体的同盟存在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但同盟行为体的存在却具有长期性的、恒久性的特征。同盟行为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比如很少有人会怀疑，北约在对抗俄罗斯方面有高度的共识，俄罗斯本身也是北约

---

<sup>①</sup> 陈至立编：《辞海》（第七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71页。

当初成立的主要针对对象。

3. 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是国际政治系统行为体的重要组成。世界性的国际组织代表是联合国。不过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独立性较强的行为体，而是受到国家行为体及其相互之间互动所制约。一些国家并不按照联合国约定的规则制度行事，尽管经常声明按照联合国规则做事，比如美国，联合国只是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奉行的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原则。因此，联合国并没有达到自由主义者的预期目标，利用制度限制国家追求地缘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对于联合国，追求国际政治权力的国家将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重要目标，如日本、印度、德国和巴西等。因此，联合国本身代表了一种世界政府的前景，各个国家在联合国的规则下和平相处、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共同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受地缘政治权力逻辑的影响，联合国的这种前景很暗淡，也限制了它能够成为独立性、执行力较强的行为体。相比联合国，一些国际地区组织的行为体特征更明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欧盟和东盟。欧盟和东盟已经发展成为能够与其他国际政治行为体开展互动的独立性行为体，与国家有所不同，但在地区政策、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中能够形成统一的对外战略与政策。

4. 战略伙伴是稍微有争议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伙伴源于火伴，古代兵制，五人为列，二列为火，十人共一火炊煮，同火的称为火伴，引申为在一起生活或工作的同伴。<sup>①</sup>在国际政治中，近年来，伙伴的概念得到广泛运用。大部分的国家几乎均把发展伙伴关系作为重要的外交战略之一。中国在发展全球伙伴方面持的立场是“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sup>②</sup>尽管名称各异，但中国希望能够与多数国家建立起伙伴关系，不断扩大中国的朋友圈。美国也重视伙伴关系的建设，包括在其推出的“印太战略”中，提出了发展战略伙伴的范围。日本、印度、俄罗斯等都将发展战略伙伴作为外交的重要原则。伙伴能否成为行为体的争议在于有的伙伴关系形成没有排他性的性质，也没有约束伙伴要针对第三方采取统一的行动。比如中国所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但有的国家发展的伙伴关系有特定的针对对象，比如美国所圈定的战略伙伴印度，其目的主要就是对付中国。而且在伙伴的理解上，可能国家行为体还会有所不同。比如中国、美国对伙伴的一般理解可能是志同道合的体现，但印度可能强调的是伙伴关系意味着结伴的自由。将战略伙伴纳入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考虑主要源于非针对性与针对性伙伴关系可能形成未来国际政治中的两种发展模式，且两种模式的博弈可能极大地影响着国际政治系统的性质，既是和平、稳定的，还是动荡、冲突的。

### （三）实践的构成要素

具备了战略构成要素系统、行为体要素系统之后，如何进行实践就成为了国际

<sup>①</sup> 陈至立编：《辞海》（第七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95 页。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0 页。

政治系统的关键。通常而言，行为体之间的战略构成要素互动发生在双边、地区与多边场合。双边互动是国际政治中最基础、最普遍的互动形式，即使是在全球化、地区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行为体双边关系仍然是其他互动形式的基础。国家行为体按照自己国家利益的优先排序来确定与其他行为体互动的内容。以美国为例。保持世界第一是美国所认定的重要的国家利益，那么根据这样的认定，美国将之贯彻到双边互动之中。因为中国、俄罗斯都有可能对美国的世界地位造成影响，因此在与中国、俄罗斯的双边互动中，就充分体现出美国外交战略中的矛盾性，既希望中国、俄罗斯能够在一些美国关心的国际问题上支持美国，又不断在双边关系中挑起各种矛盾纷争，干涉内政，打击潜在对手的发展进程。比如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贸易战”、科技战轮番上演。美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双边互动以安全因素最为引人注目，因为美国的目的很明确，通过双边军事同盟的加强以阻击中国的崛起，当然也为多边同盟奠定牢固的双边基础。比如在韩国部署导弹。从根本上讲，双边关系互动是受到行为体要素系统影响和制约的，即行为体对自身以及对他的认识决定了双边互动的主要内容与过程。

以地区为核心的互动是国际政治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全球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的产物。这种互动模式是一个地区的国家行为体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而整合到一起，以高度一致性和统一的政策与其他行为体展开互动。这样的组织最成功的在欧洲地区与亚洲地区，前者为欧盟，后者为东盟。两个组织最初成立的目的都源于安全因素的考虑，后来却成为地区一体化最成功的代表。地区组织的崛起在于地区内的中等强国、中小国家不断意识到单凭国家行为体难以与其他超级大国、地区大国行为体形成相对平衡的互动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以增强在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博弈能力。欧盟与东盟都发挥了地缘政治经济的引力作用，成为了国际政治系统中最具吸引力的两个磁场，尤其东盟，成为区域内外行为体投放战略要素的核心地带。

多边互动是国际政治中的常在现象，比如同盟。不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多边互动也不再局限于同盟，尤其是经济层面的多边互动不断出现。欧盟与东盟本身也是多边合作的成果，即地区内成员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统一行为体，已经形成安全与经济同盟并重的行为体。多边互动中的战略要素不仅是安全的或者经济的，也是综合性的。在全球层次上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G20、G7等多边合作组织。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多边互动最活跃的地区，上海合作组织囊括了俄罗斯、中国、中亚国家以及部分南亚国家，金砖合作机制中的俄罗斯、中国、印度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RCEP）拥有东亚、东南亚、大洋洲的成员国，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协定（CPTPP）包括横跨太平洋两岸亚洲国家和美洲国家，美日印、美英澳等军事同盟正在被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



机制也正向着同盟的方向发展，日印澳、印澳法、印澳意等以海洋安全为核心的合作三边在不断扩散，构筑战略三角同盟的企图也显而易见。当然最核心的是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机制，尤以东亚峰会影响最为突出。在这些多边机制中，有的是松散协调关系，比如金砖合作机制，同盟化之前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G20、亚太经合组织等。有的以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为主要互动纽带，如上海合作组织聚焦于非传统安全，美日印澳、美日印等忙着对付中国。有的既有安全的要求，又有经济上的考虑，比如日本主导的CPTPP。有的以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为主线，比如RCEP等。

双边、地区、多边实践要素之间构成了行为体互动的战略叠加与重叠的现象（见图1）。同一行为体既是双边互动的推动者，也是地区与多边互动的重要或非重要成员。鉴于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最有力的行为体，因此地区、多边互动多从双边得到推动，地区、多边又为双边互动的增强提供了机会。比如美国主导的多个多边同盟在联合国大会、东亚峰会等舞台上进行政治交往、达成共识。双边、地区、多边的实践活动有排他性与非排他性两类。排他性的多边互动一般具有比较特殊的目的，比如针对某一或某几个行为体。非排他性的多边互动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包容性的特征，其针对的一般不是其他行为体，而是解决全球与地区的发展问题，但有时也会沦落为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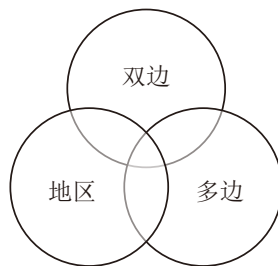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实践要素相互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四）动力的构成要素

国际政治系统终极的力量可能可以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变迁，但国际政治系统的发展变化过程主要取决于四种动力的合力，即取决于合作、竞争、冲突与战争博弈的结果。这四种行为是国际政治动力维度系统的共同组成部分，往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伴随。往往其中一种就包括了其他三种。四种动力维度的此消彼长决定国际政治系统的发展方向与性质。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没有合作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国家的出现，人与人之间将处于普遍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合作是社会互动的一种方式，指个人或群体之间为达到某一确定目标，彼此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联合行动。参与者具有

共同的目标、相近的认识、协调的互动、才能达到合作的预期。<sup>①</sup> 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成为国际社会以及国际政治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互动行为。合作的领域是广泛的，可以包括军事、安全、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广义的上合作不仅发生在友好国家之间，也可以发生在敌对国家之间，比如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系统以美苏对峙为特征，但美苏之间在军事与安全领域也达成了一些合作机制。这种合作保证了冷战时期两极的国际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今天的国际政治现实也是如此，尽管美国敌视中国的发展，必欲“阻”之而后快，但在一些问题，比如经济、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等问题上也需要与中国开展合作。因此，与盟友的合作似乎理所当然，但与处于竞争地位，甚至敌人地位的合作也并不必然被排斥，只是在合作的深度、广度、选择度上会有比较大的区别。

国际政治中的合作往往离不开竞争。美国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加强合作的动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遏制以及竞争的战略考虑。美国不断强化与中国竞争的互动模式。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日本也强调要继续构筑与中国的稳定关系，对中国坚持该坚持的，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态度的同时，继续与中国进行对话，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合作。<sup>②</sup> 竞争的本义指互相争胜。<sup>③</sup> 国际政治中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争胜。现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竞争主要以西方制度和非西方制度竞争为主线，具体内容包括制度管理、经济发展、军事水平、文化支撑等内容。在西方霸权下，西方确立了西方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普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也造成了西方国家对其他制度的排斥性思维。其他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制度往往被冠之以各种不雅名声，如独裁、专制和集权等。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当前的国际政治系统呈现出中美竞争以及溢出效应的特征。甚至有学者提出了现实制度主义的新秩序：一方面中美两国围绕权力、利益和尊严展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以国际规则制定和伙伴网络缔造为核心的竞争，两者共同构成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新图景。<sup>④</sup> 应该说，这一论断较为准确地描述了当前国际政治的发展特征，美国正是以规则为标尺，试图将中国紧紧压缩在一定的战略空间之内。还有另外一种制度相争论，即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争。从本质上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确实是政治制度上的竞争，即哪一种制度更能在持续、长期的竞争中胜出。

合作、竞争在国际政治中具有普遍性，冲突同样在国际政治中具有普遍性。冲突是可以运用到多个学科领域的多义项概念。在社会心理学中，冲突指个体或群体

---

① 陈至立编：《辞海》（第七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53 页。

② “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https://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

③ 陈至立编：《辞海》（第七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237 页。

④ 李魏：《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2—213 页。

在追求某种目标或价值观念的过程中知觉到来自对方的阻挠，从而产生对立的社会行为，形成个体与个体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压制、破坏甚至消灭对方的方式与过程。<sup>①</sup> 国际政治冲突则主要指行为体之间因不同而发生的利害关系矛盾。在较为广泛意义上，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如经济冲突，比如“中美贸易战”；有军事冲突，比如印巴之间经常爆发的边境交火；有文化冲突，关于这点赛缪尔·亨廷顿专门写了一部著作讨论文明冲突论。在心理冲突上（根源上也是文明冲突）的突出表现是西方国家从内心不认可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非西方国家也不认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常在性的冲突因素，甚至很多时候规定了行为体之间的其他冲突形式。比如美国坚决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可以堂而皇之地向澳大利亚扩散核技术。冲突不仅限于敌对的国家，也存在于关系友好的国家，甚至同盟内部。比如美日同盟之中同样存在着冲突的博弈，日本政治家必须考虑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给当地民众带来的耻辱感，因此往往要在军事同盟与民族感情之间寻找平衡点。当然，这样的冲突是以比较缓和的形式体现的。因此，冲突在国际政治中普遍存在，只是有时表现得很激烈，有时候表现得不那么激烈。

战争是超越军事冲突层面的行为体之间的大规模较量。战争主要指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之间为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sup>②</sup> 大致可以将战争分为内部战争与国际战争。内部战争主要是一个行为体内部的战争，比如美国内战，中国的解放战争。国际战争则主要是各个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比如以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客观来看，内部战争与国际战争之间并非必然分离的，比如美国内战的国际背景是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之间的博弈，中国解放战争则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从性质上划分，战争还可以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往往必须强调“师出有名”。比如《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此种表现。春秋战国时期各个霸主以周天子名义四处讨伐，讲究的也是战争的“正义性”，尽管有后世人认为多数霸主进行的是“不义战”。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普遍来讲，反侵略战争、解放战争具有正义性。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肯尼思·华尔兹指出，人类的本性导致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遭受苦难，一切罪恶均源于自身，战争，这一特定的罪恶亦复如是。<sup>③</sup>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诸如“一战”和“二战”那样的世界大战以及全面战争已经得到极大约束，因为在核武器的背景下，难以承受战争的后果已经是国家行为体的理性共识。局部战争则仍然存在，并在很多地区不断出现。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和全面战争是摧毁国际政治系统的最直接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彻

① 陈至立编：《辞海》（第七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70 页。

② 陈至立编：《辞海》（第七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531 页。

③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页。

底摧毁了英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取而代之，优势地位一直持续至今。国际政治系统中的行为体重新洗牌，老牌帝国衰落，新帝国崛起。大量的民族国家开始出现，有的民族国家则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图2 国际政治系统动力线性特征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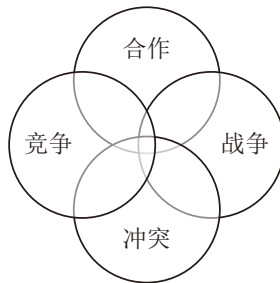


图3 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动力相互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合作、竞争、冲突、战争四个动力要素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合作往往伴随着竞争、冲突，甚至是战争。比如世界大战中盟友之间的合作，敌对双方的竞争、冲突与战争。四种动力有线性上的关系，即行为体之间可能由合作竞争过渡到冲突与战争（见图2）。另外一方面，四种动力更是网状的关系，包含彼此。从理论上讲，四种动力都有改变国际政治系统的潜力。就单纯的合作而言，如果各个行为体能够放下成见，真心合作，似乎就可以改变国际政治系统的性质和演进方向，实现世界大同。但是基于行为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纯粹的合作几乎不存在，即便是盟友之间的合作也是因为有共同的针对对象。单纯的竞争、冲突的现象也越来越难以见到，“中美贸易战”持续的期间，双方仍然保持了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中美贸易额并未因“贸易战”的出现而消失甚至大幅度下滑。中印在边境地区的冲突也并未完全抵消双方的合作路径。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四种动力都有改变国际政治系统的潜力，但往往并不会单独起作用，而是四种力量的合力推动国际政治系统的演进（见图3）。

### 三、国际政治系统的复合属性

据前面的叙述足以发现国际政治系统的复合性。作为国际政治系统的行为体本身就构成了多元结构，由不同的国家行为体、组织行为体、同盟行为体、战略伙伴

关系等构成。战略要素也是多层次构成，每一个行为体的战略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多个行为体的战略互动构成了更加复杂多元的地区与国际政治系统。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是发散性的，以双边互动为基础，向着多边的方向不断拓展。在动力系统上，各种力量的博弈最终决定着国际政治系统的演进和发展。换言之，国际政治系统（包括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系统）呈现出复合型的特征，系统由子系统构成。总之，战略构成要素、行为体要素、实践要素、动力要素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基本框架（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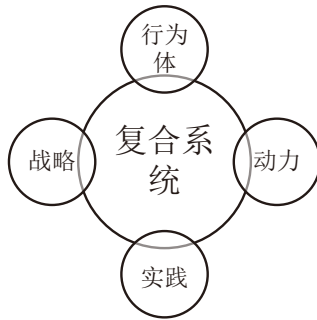


图4 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国际政治系统中的行为体是根，是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前提。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复合性决定了战略、实践、动力的复合性。行为体不仅包括了文化、思想、规模、行为各异的国家行为体，还包括了地区组织、国际组织、同盟等扩大了的行为体。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复合性决定了战略的多元性、实践要素的非单一性以及互动过程的复杂性。有学者提出“复合世界”概念，该概念是基于美国霸权衰落，世界将去中心化，形成一个多元或复合的世界。<sup>①</sup>国际政治复合系统显然要比多极世界的认识更为深入一些。国际政治系统之所以是复合的，不仅因为行为体的多元，更因为系统由系统（子系统）构成，而且在每一个构成系统之中均可以找到行为体、战略构成、实践与动力四个要素。比如说如果确认“印太”为一个地区层面的国际政治系统，那么显而易见系统的各个组成系统是明显和明确的。如果将组成系统的日本或美国作为一个系统，四个要素也是非常明确的。比如日本的“印太战略”系统行为体包括了地区内外的国家，战略构成包括了军事、经济、安全多策略，实践互动也是在双边、地区和多边进行，演进的动力也包括了合作、竞争、冲突和战争（准备）。这是国际政治系统具有复合属性的重要表现，系统由（子）系统构成，这种循环甚至可以适用到代表具体的人，比如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喜欢以推特治国，每一条推

<sup>①</sup> 阿米塔·阿查亚著，姚远、叶晓静译：《建构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动性与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24页。

特都有其他行为体在关注，根据他的行为行事和博弈。

国际政治系统的复合属性并非迷宫，最关键的还在把握国际政治行为体能动性上。客观来看，在国际政治系统中，行为体的历史经验为后来的国际政治复合系统博弈提供了学习经验，即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产生了路径依赖。所谓的路径依赖，主要指具有反馈机制的体系在系统内确立并沿着特定路径演进而难以被其他潜在体系替代的现象。<sup>①</sup>在国际政治领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国际政治系统的形态是不断在更替的，而身处其中的行为体不断从中获取信息，并进行学习，形成新的路径依赖。而这些路径依赖很难得到改变，也决定了国际政治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也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

以今天的国际政治系统为视角，其中至少存在五种类型的路径依赖：霸权路径依赖、安全路径依赖、经济路径依赖、追随路径依赖、游离路径依赖（见图5）。霸权路径依赖主要包括全球霸权国家和地区霸权国家。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和印度。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至二战结束之后确立其霸权地位以来，美国就逐渐形成了霸权路径依赖，即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断在全球寻找潜在的敌人，消除对美国霸权的现实或潜在威胁。在学术话语与知识的积累上，如何维护美国霸权不衰落成为了主旋律。不管是现实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抑或是建构主义，再或是讨论大国的兴衰，创造“修昔底德陷阱”概念，都与自觉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紧密相关，形成了霸权路径依赖，也是美国将中国确立为敌人并要进行打击的重要根源。印度的能力尽管让很多人怀疑，其表现有点像历史上的意大利，自认为很强大，但能力不足。在行为上，喜欢模仿美国，做霸主。在这点上，印度也形成了霸权路径依赖。一方面，印度霸权路径依赖来源于英帝国留下的历史心结。印度总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英国能够做到的，不顾自己能力的不足与国际政治的变化，一切战略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能够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地区与全球权力。另一方面，印度霸权路径依赖来源于其长期在南亚地区称霸的现实，来源于其在长期的印巴竞争中逐渐获得压倒性优势。因此，印度战略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试图竭力维护和巩固印度在南亚地区的霸权不受影响。所有的对外战略都在有意无意加强印度的霸权路径依赖。

安全路径依赖在亚太地区政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日本、东南亚国家的地区对外战略都将美国看作安全的保障，尽管这些国家也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在安全议题上更相信美国，不断加强与美国合作，造成安全路径依赖的出现。出现这样的路径依赖，主要是过去美西方国家对全球殖民带来的强大话语权与生活方式的改变，造成这些国家宁愿相信美国及西方国家所说的，而不相信所谓非民主国家所说的，即使后者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安全路径依赖的形成还在

<sup>①</sup> 陈至立编：《辞海》（第七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13页。

于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地缘政治竞争，“远交近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历史遗产总在发挥作用，也在影响着国际政治系统中的行为体战略选择、实践选择与动力博弈选择。印度对华战略中安全路径依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霸权路径依赖的基础上，印度将中国视为最大安全威胁来源，既有担心中国侵蚀其南亚霸权的考虑，也有自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感受。

经济路径依赖曾经是全球一体化与地区一体化的重要过程。大多数的行为体都能够在经济上获得发展机会，但如果说到经济路径依赖特征最为明显的国家，可能要数中国最为显眼。在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中国经济路径依赖的形成源于自身的历史记忆，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记忆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始终将经济放在重要位置，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这点也体现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与协调上，地方上分管经济的领导通常级别都比较高，主要是为了便于协调各个不同部门为发展经济的核心任务服务。<sup>①</sup>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路径依赖的形成基于改革开放，积极施行经济外交的历史经验。成功的经济外交，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迎来了崛起时刻，逐渐与世界主要大国或组织成为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些经验都促使中国形成了经济路径依赖的特征，在所有的战略中，强调经济手段为主。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坚持经济一体化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与多数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与安全合作排在次优的位置。经济路径依赖促使中国更愿意从经济利益去考虑国际政治问题，甚至可能会形成没有钱不能解决的国际政治问题的惯性思维。比如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会有人认为印度总在边境地区闹事，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这其实是受长期经济路径依赖而形成的后果。很大程度上，经济路径依赖也是中国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背后逻辑。

追随路径依赖主要体现在同盟阵营或体系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是欧盟国家与日本、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高度认同美国霸权之下的国际政治体系，他们不能想象没有美国霸权之下的国际政治前景。形成这种路径依赖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组织和国家在长时间内形成了美国最为强大的认识，同时也因为价值观类似，或遭受美国的胁迫，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美国的地位，自觉地与可能威胁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进行斗争，甚至采取统一行动。在这点上，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日本虽然是东亚国家，却长期“脱亚入欧”，身体是亚洲的，心却在欧美。尽管日本也很看重经济利益，但在事关地区支配权的问题上，日本无法想象由中国支配的前景，其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前景，因此为了维护美国治下的东亚秩序，日本将美日同盟摆在地区战略中的首位，大多数日本首相在上台执政的时候均要强调这一点。事实上，日本追随路径的形成可能与美国的军事胁迫有关，毕竟美国利

<sup>①</sup> 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剑在悬，日本可以选择的空间并不大。澳大利亚与韩国同样如此心理，均愿意接受美国霸权下的地区秩序，不愿意看到潜在或现实的替代对象出现。澳大利亚容易理解，因为它是英语圈国家，认同美国的霸权逻辑并不难。韩国追随路径的形成更多的是基于历史经验以及现实的地缘政治考虑。越南战争的案例充分说明一旦不追随美国，韩国难有自信面对朝鲜，其中还有对中国的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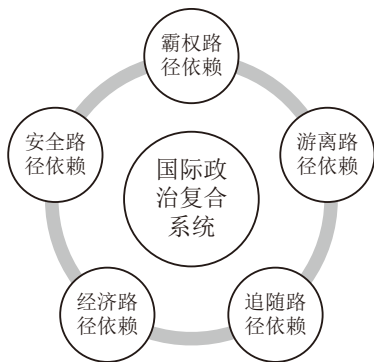


图5 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的五种路径依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游离路径依赖产生主要源自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甚至是极端主义思想，面对全球一体化与地区一体化很难做出有效反应，既不认同西方国家的霸权模式，也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做出努力，长期游离于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边缘，形成游离路径依赖的现象。就内部原因来看，形成游离路径依赖的国家往往治理不善，政治更迭不平稳，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基于安全与地缘政治现实的考虑，部分行为体以中立国家的身份形成游离路径依赖，即不参与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遭受霸权国家的排斥是一些行为体形成游离路径的外部原因。这些国家由于不认同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或者在地缘政治上不愿意配合霸权国家的战略，遭到霸权国家的孤立、制裁、封锁等，客观上不得不游离于国际社会的边缘，甚至被霸权国家或者西方国家打上“失败国家”的标签。

路径依赖是国际政治复合系统运动的结果，同时又对国际政治复合系统起着反作用。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运动使行为体产生了分化，搞地缘政治小圈子的、重视经济发展的、谋取地区霸权的战略纷纷出现，并在动力竞合之中形成了路径依赖。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一旦形成很难发生改变。这也被今天的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发展所证实。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说明美国自身对霸权地位的维持甚至加强的态度很难发生改变。中国继续推进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说明中国仍然将经济外交放在地区战略的首位，尤其是中国不仅帮助推动RCEP的实现，还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尽管外界可能解读中国此举更多的



是为了破解美国的地缘政治包围圈。但也说明中国仍然在坚持经济外交的路径。日、澳逐渐从安全路径依赖与经济路径依赖偏向追随路径。

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与此前的国际政治复合系统有较大的不同。此前的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终极变迁或者突变多数都有战争的因素，为此爆发了全面战争与世界大战。此后的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改变虽然依然是建立在经济力量发展的基础之上，但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对于用战争促进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突变都表现得非常谨慎和小心。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禁忌。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路径调适与反馈的现象。因为如果按照路径依赖的发展方向，霸权路径依赖的结果必然要爆发战争。但在现有战争限制的条件下，霸权国家的霸权路径依赖会不得不出现调适因素，比如霸权国在某些时候会表现得相对温和，在激进的道路会出现理性刹车，以防止难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出现。当前美国霸权对中国的定位变化较为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见图6）。从中美建交至奥巴马政府时期属于美国霸权对中国相对温和时期，特朗普政府时期属于激进时期，拜登政府时期则属于调适期。但不管处于什么时期，美国总体的霸权目标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都是为了消解中国对其霸权可能带来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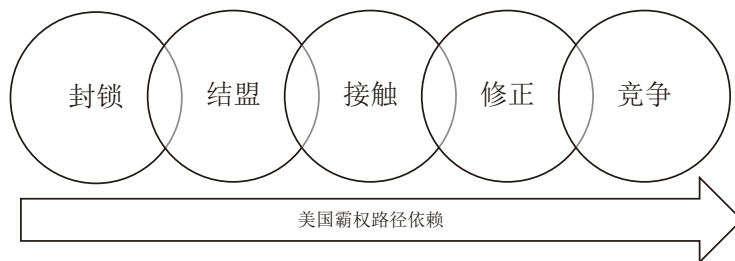


图6 中美关系中的霸权路径依赖与路径调适关系示意图（1949—2021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发展趋势来看，核武器对战争的禁忌作用并非一成不变。在核武器拥有国之间保持理性平衡时，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和平状态有可能得到维系。当核武器拥有国之间失去平衡时，尤其是形成一个核武器拥有国军事同盟共同针对一个核武器拥有国时，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突变因素战争就可能出现，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针对者不仅现有的核武器无法升空，而且“二次打击”的机会可能丧失。在这样的情况下，霸权国家霸权路径依赖的主动调适空间会逐渐消失。

总之，正如在前文中已经论及，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分析可以从单行为体视角与多行为体视角切入，前者以一个国家的地区战略为分析抓手，继而考察参与行为体、实践要素与动力博弈。后者以多个国家行为体的地区战略投入为目标，再进而分析

其他要素。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路径依赖理论对深入认识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博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各种不同类型的路径依赖对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演进具有促进、制约等作用。

#### 四、国际政治复合系统论的意义

从复合系统的视角认识国际政治具有多重意义，不仅可以把握行为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可以使行为体的外交决策符合客观要求，把握行为体路径依赖的特征并把握战略调适的空间。与此同时，生产力是复合系统演进的一般性要素，这对于深刻认识大国博弈尤其重要。国际政治复合系统对于深入认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特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用国际政治复合系统思维观察和把握行为体与世界的关系

国际政治复合系统要求不能以单线思维来看待国际政治博弈，只能从多维角度，尤其是用复合系统的视角来看待本国所处的时间与空间位置，才不至于迷失在国际政治博弈的时空之中，甚至被淘汰。在这点上，国际政治复合系统对我们观察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显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历史文明来讲，中国有着一直持续的文明脉络，曾经强大过，也曾经衰落过，于时间而言，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甚至是生死考验；于空间而言，中国今天又走到了历史的关口，正处于崛起的发展阶段，霸权国家的霸权路径依赖不允许中国的崛起，势必要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击。那么国际政治系统复合系统思维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一是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的行为体的多元性表明霸权国家想要维系霸权路径依赖并不容易，想要统一所有行为体共同针对中国的前景并不存在。二是战略利益的多元复合性表明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仍然存在其他路径依赖，比如经济路径依赖，中国在国际政治系统中的斡旋空间仍然存在。三是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的多重实践要素表明中国所坚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仍然受到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地区组织的支持，说明经济合作的空间仍然存在。四是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的动力博弈则告诉我们应当如何与世界互动，寻找合作因素，消解冲突因素，防止战争爆发。

##### （二）行为体外交决策必须遵循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客观要求

国际政治复合系统充分说明国际政治博弈的持久性、复杂性、重复性和曲折性，妄想通过一项决策就能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是不现实的。国际政治复合系统要求在进行外交时既要擅长与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进行多重博弈多重外交，又要善于在地区大国之间斡旋，同时还要在与中等强国、中小国家的外交中攫取力量。在所有这些外交博弈中均必须展示足够的灵活度。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要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坚持实事求是：既不盲目地夸大自己，也不要随意地贬低博弈对手；

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卑躬屈膝。在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必须遵循多重博弈的原则，即在军事博弈、安全博弈、经济博弈和人权博弈的多重博弈中，对统一或交织的博弈都应当谨慎，尤其要避免使行为体处于与多个大国同时对抗中。实际上避免一个国家与多个大国同时对抗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决策者应当长期牢记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在核武器时代，核武器同盟一旦形成可能使中国二次打击的威慑不复存在，战争的风险就可能加大。总之，在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实事求是与灵活性是基本的博弈要求，不应或时而忘。

（三）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路径依赖有着较大的调适空间

行为体的路径依赖形成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当前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中，最大的路径依赖的空间调适前提依然有效：即这是一个多个行为体之间能够相互运用核武器毁灭的国际政治系统，那么在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路径依赖上就有主动与被动调适路径依赖的需要。实际上，在当前国际政治系统中，绝大多数的行为体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调适自己的路径依赖，避免路径依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中国正在调适经济路径依赖，从更全面的视角来推进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尤其是提出了生态、绿色发展的理念，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负责任发展的信息。美国则在强化霸权路径依赖的同时，也需要调适与竞争对手的关系，避免这些关系走进死胡同，反而影响自己的霸权事业。日本也在追随路径依赖上向经济依赖调适，并没有决然隔断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与联系，与美国和印度的举动形成较为强烈的对比。换言之，尽管日本有着追随路径，但却为经济调适战略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包括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并不排斥与中国的合作。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在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路径依赖中加强调适的能力，即利用主客观条件积极调适各种对中国不利的路径依赖。

（四）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变迁历史充分说明生产力的先进性始终是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般性要素

国际政治系统的演变不管是渐进还是突变，生产力的先进性都发挥着一般性要素的作用，对国家行为体的启发就是必须长期保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领域的先进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sup>①</sup>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sup>②</sup>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极目标的，要促进终极目标的实现，大幅提高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就必须得到一贯的高度重视。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虽然位居世界第二，总量也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1页。

日益向美国靠近，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平均经济指标要落后于很多国家。在科技领域，中国仍然在一些关键领域有待实现突破；在金融领域，美元仍然处于金融霸权的顶端；在互联网领域，话语霸权仍然被西方国家所主导。过去的历史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而在未来面临国际政治系统可能无序的挑战，高效度的生产力仍然是决胜的关键。换言之，国际政治系统斗争的结果取决于生产力的高低，这是我们要时刻谨记的。

（五）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现实主义特性为理解“执假为真”现象的存在提供了空间

“执假为真”内涵可以深刻地反映国际政治丑陋的一面，固执于所谓的“国家利益”“大国政治博弈”，不惜人为制造对其他行为体的虚假意象，并以此作为前提推进地区安全战略，处置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执”，拿、持之意，“假”，非真也。如果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对别的国家行为体构造虚假意象是不道德的，应当被人类社会文明所唾弃。然而，与这样的现象相反，“执假为真”现象普遍存在于国际政治系统中。比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与前提为美国所虚构的制造生化武器意象，成为美国施行地区战略的重要借口。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的印度，其地区战略，尤其是在针对中国方面的战略，“执假为真”的特征较为明显。比如中国“一带一路”外交“债务陷阱论”就由印度所发明，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与一些国家的互动，尤其推进部分国家以债务为借口借机向中国反复要价，极大损害了中国对外合作形象与合作收益。在印度东进战略中，印版“珍珠链”正是基于虚构“中国威胁”意象的基础上的筹谋与计划。客观来看，“执假为真”的印度东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合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也同时为印度的东进带来了不确定性。

国际政治系统中“执假为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客观局限”。所谓客观局限，就是客观上存在一些条件，导致行为体对他者的认识出现偏差，将虚假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而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也为虚假信息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空间。自身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造成“客观局限”出现的重要原因，在这点上，也可能是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复杂性所导致的。“盲人摸象”的寓意众所周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人类经常在犯的错误。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经验、知识对事物进行判断、辩驳，据“理”力争，但往往认为真理在自己手中之时，却掉入“盲人摸象”的陷阱之中。印度“阿三”之呼在中国很有市场，也代表了国人对印度人乃至印度这个国家的印象。这里的局限就在于，以刻板不变的认知去认识印度，显然不会获得一个颇为客观的形象。反观印度，同样在对他的认知不足方面付出惨痛的代价。比如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正源于其对中国的刻板认知，即身处困难之境的中国不可能会对印度的挑衅做出实质性的反应。事实证明印度看准了中国面临的外部环

境，但对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却认知不足。

国际政治系统中的“执假为真”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主观故意”。与客观局限不同，“主观故意”涉及道德的问题，其驱动的逻辑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游戏。如果说客观局限重在因认知条件、能力的不足导致对他者的认知出现偏差，那么主观故意就是明知事实并非如此，还要蓄意编造谎言，遂行自己的目的。比如部分国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借口，塑造中国“债务陷阱”制造者形象，其中，尤以印度在虚构中国的这个意象方面显得非常卖力，实质是出于维护其地区霸权地位所做出的行为反应。事实的真相在于中国基于较为成功的经济外交的历史经验，提升和扩大这种合作，并以历史基因作为传承，宣扬友好合作的意思。但明显其他国家行为体出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比如地区权力的争夺，从而主观故意地塑造中国的这一意象。虽说美国、印度等行为体对中国的地区、外交策略各种曲解，但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再如美国西方国家积极塑造中国“威胁”周边安全的意象，所谓的“珍珠链”战略正是这样的产物。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使用军事威胁或武力主动侵略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割占一寸土地，边界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谈判的手段，甚至香港的回归都是按照此前的“不平等条约”办事，期满回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在保持克制，主张以和平手段进行解决。不过，国际政治系统中的部分行为体却罔顾这些事实，主观故意地制造“中国安全威胁”的意象。这些国家，比如美国之所以要对华执行“执假为真”的战略，其真正的意图正是害怕中国后来者居上，削弱其霸权，削弱其“世界警察”的权力。

第三种“执假为真”的来源，兼具客观局限和主观故意。客观而论，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杰出代表是罗伯特·杰维斯，其不仅深入研究分析了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错误知觉的方案，比如让别人清楚地了解自己意图。<sup>①</sup>但这样的方案遭到现实主义的挑战，因为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一个国家行为体不可能知道另一个国家行为体的真实意图。罗伯特·杰维斯在另外一本作品中更系统地论述了行为体要在国际政治中奉行“主观故意”的逻辑。<sup>②</sup>可以说，不管是从心理因素去研究，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解读，国际政治系统的复合性为“执假为真”的现实主义逻辑大行其道提供了条件，从而国际政治复合系统也具有了现实主义的特性。不过，从乐观主义的角度看，国际政治复合系统虽然有不确定性，但也并非全然无迹可寻。

[责任编辑：孙喜勤]

---

①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7—471页。

② 罗伯特·杰维斯著，徐进译：《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